

文章编号: 1673-9973(2022)01-0011-05

政府管理

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舆论风险的基本策略及经验启示

吴锋^a, 唐瑶^b

(西安交通大学 a.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049)

摘要: 对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水平是衡量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关键指标,也是检验一个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回顾建党百年来党内外发生的对党的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可以看出:在建党百年来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历程中,我党逐步形成了“内外有别”的舆论引导模式。对于党内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对于叛逃叛变类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强调根据涉事对象身份的差异分别采用正面舆论交锋或维稳基础上的大规模舆论宣传两种策略;二是对于贪污腐败类突发事件,我党则通过媒体及时向公众通报调查进程和有关人员处理结果,形成强大舆论震慑。对于党外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一是强调全域性舆论引导阵地的建设,二是强调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及时性,三是在舆论引导中将“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结合起来。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重大突发事件; 舆论引导;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22.01.002

The Basic Strategy and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Deal with the Public Opinion Risk of Major Emergencies

WU Feng^a, TANG Yao^b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b. School of Marxism,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level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major emergencies is a key index to measure the maturity of a political Par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to test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a political Par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object of emergencies that have occurr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rty in the past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nd has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major emergencie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n the course of handling major emergencie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f the founding, the Party has gradually formed a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odel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erences”.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for party emergencies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kinds: for one,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emphasizes the head-on or mass public opinion publicit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identity of the object involved; the other is, the Party promptly informs the public of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and the results of relevant personnel through the media to form a strong public opinion deterrent. For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non-Party emergencies: first, to 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positions, second is to emphasize the timelines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for major emergencies; third is to combine “self-narrative” and “others narrat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jor emergency;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及舆论引导水平是衡量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关键指标,也是检验一个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及舆论引导举措适时适当,则可兴党强国;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及舆论引导举措失时失当,则会误党害国。回望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我党正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艰苦创业、披荆斩棘、历经磨练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政党,一部百年党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突发事件应对史及舆论引导史,中国共产党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多

收稿日期: 2021-1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重大突发灾难事件中的新闻报道伦理规范及影响因素研究”(20BXW2838)

作者简介: 吴锋(1977-),男,湖北郧西人,传播系主任,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高校新型智库“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及传媒经营管理研究;唐瑶(1991-),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史。

政府管理

发频发的新挑战、新考验,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启示,是党员干部克服本领恐慌、化解能力不足的重要途径。此处的重大突发事件,是指在党的创立、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发生的对党的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分为党内突发事件和党外突发事件两类,其舆论引导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以下分述之。

一、党内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

党内重大突发事件是指发生在党内,对我党建设和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突发事件,主要包含两大类。一是影响我党团结稳定的叛变叛逃类突发事件。建党初期由于党的力量比较薄弱,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足,党的制度建设也不够完善,党员干部甚至高层领导叛变叛逃类突发事件并不罕见,典型代表如张国焘。二是影响我党形象、关系民心相背的贪污腐败类突发事件。党内腐败分子往往是“双面人”,明面上他们可能是战斗英雄、人民公仆,深受党的信任和百姓爱戴,背地里他们是贪污腐败分子,强烈的人物形象反差通常会使贪污腐败类案件演化成重大突发事件。对于这两类突发事件,我党形成了不同的舆论引导机制。

(一) 叛变叛逃类突发事件舆论引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不仅缺乏充足的外部资源及物质条件,而且党内外环境极为复杂,国外有侵略者的绞杀,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强,革命理想和信念不够坚定,在面临敌人严刑拷打或在敌对势力策反下变节通敌叛党。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导干部分叛逃类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大幅度下降,但仍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在敌对势力的引诱下叛逃,如1957年12月17日原解放军福州军区高炮63师中校副师长张清荣叛逃台湾。因部分叛逃叛党者占据党内高层职务、且掌握党内重要机密,因而此类突发事件通常会带来较大舆论冲击,严重影响党的团结稳定及党的形象。对于叛变叛逃类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主要分为两种方式:对于公开宣布叛党并公然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党采用直面问题,正面交锋的舆论引导策略;对于会产生震动性影响的重要领导叛逃事件,则在维稳和脱敏的基础上面向公众展开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

1. 直面问题展开正面舆论交锋。对于公开脱党、叛逃的突发事件,我党采用直面问题,正面交锋的舆论引导策略。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但在抗战爆发后,他趁祭黄帝陵之际叛逃,投靠国民党。周恩来等人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脱党的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教育党员干部、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同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通过对张国焘开除党籍,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声明,表明了我党严明党纪军纪,对叛逃类事件零容忍的鲜明态度。新世纪以来的典型案

例如2012年2月6日至7日,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对于王立军的叛逃,我党在查明事件来龙去脉后进行了大规模报道,并公开了庭审现场,表达了我党对叛逃现象的零容忍。

2. 在脱敏的基础上展开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极少数高级领导的叛逃事件会给党的形象和党的建设带来一定程度的震动,甚至会在国内外舆论场上造成重大影响,对于这类突发事件舆论处置必须慎之又慎,最大限度减少它对党的形象和党的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这类高级干部叛逃类事件,党的舆论引导策略是强调在脱敏和维稳的基础上展开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其中典型案例为“林彪叛逃案”。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林彪从山海关机场乘飞机出逃,事发后,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对该事件的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经历了严格管控—适当放宽—再次严格管控的过程。

首先,在没弄清事情真相之前,为了避免外界的猜测而引起动荡,我党采取内部从严的舆论引导策略。对外时刻关注莫斯科广播电视台,一旦有林彪的报道和动向随时向党中央报告。对内一是暂停对林彪的一切宣传和报道,将与其相关的信息删除干净,例如在广播中去掉林彪的名字、停播一切赞颂他的文章、歌曲和节目。二是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鼓舞民心。在外媒无报道之前,我方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变化。其次,在得知林彪一伙有可能坠亡在蒙古后,为了争取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党中央提出了内紧外松的舆论引导策略。在适度公开、统一口径、严格控制的原则下逐步放开对林彪的报道。开始在一些报道中有计划有控制地出现林彪的名字。再次,在明确林彪一伙确实摔死于蒙古之后,为了赢得“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消除国内外舆论场上的种种猜测,在公开宣传中对“林彪等”的管控又放宽一步,此举对内消除了公众的疑虑,维护了国内局势的稳定,对外澄清了外媒的种种猜测。最后,在我党做好充分准备之后,展开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逐级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之后则在公开报道中点名批评。公开点名批评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则不能再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二) 贪污腐败类突发事件舆论引导

贪污腐败类突发事件的处置和舆论引导事关我党形象和民心向背,舆论引导得当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舆论引导失当则会极大损伤党的形象。对于党内贪污腐败类突发事件我党在坚持从严治党、一视同仁的基本原则上采用主动公开的舆论引导方式,通过媒体、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等形式及时向公众通报调查进程和有关人员处置结果,形成强大的舆论震慑。在针对此类事件的舆论引导中,我党主要有3类不同的策略。

1. 充分利用报刊还原事态真相,面向大众进行舆论引导。贪腐类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发布的滞后

政府管理

和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会造成流言和谣言的迅速传播,严重时会导致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撕裂,引发信任危机。对此,我党积极利用报刊等媒介公布事件的处置进程和处理结果,防止因信息不透明带来的流言和谣言,造成人民对党的不信任。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就形成了利用党报党刊对贪腐类突发事件进行舆论引导的惯例。如在瑞金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唐仁达贪污案中,取得调查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报》第138期予以公布。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并在会议上通过了对唐达仁等人的处分结果。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第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报道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死刑,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1]贪污腐败案暴露后及时通过报刊等媒介公布事件的真相、事件的处理进程和处理结果,使百姓明确事态的进展,避免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不一致带来舆论上的被动局面。

2. 坚持利用典型案件教育党员干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从严治党、一视同仁是我党进行贪污腐败类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基本原则。仅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处死的为党和人民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贪污腐败官员和战士就有7名。其中以“黄克功案”和“肖玉璧案”最为典型。党中央利用这些贪腐案作为反面教材,开展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形成了强大舆论震慑,达到了教育党员干部的目的。

黄克功从战斗英雄沦为杀人犯震惊了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国,是当时关注度极高的重大突发舆情事件。1937年10月5日晚,抗大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16岁的女学员刘茜。被捕后黄克功以“资格老”“功劳大”自居,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会对他从轻处罚,并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战死沙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经过慎重讨论,认为不杀黄克功难以平息社会上的谣言,决定对黄克功处以极刑。^{[2]58-60} 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是当时对通过负面典型人物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教育和舆论宣传的重要方式。在黄案的公审大会上,毛泽东要求当场宣读他写给雷经天^①的信,毛泽东在信件中明确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2]65} 处死黄克功后,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在公审大会上作了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

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并指出大家要从黄克功案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肖玉璧案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肖玉璧是老革命战士,身上有90多处因战斗留下的伤痕,在延安养伤期间毛主席曾多次探望。考虑到肖玉璧是负伤累累的老红军,组织上出于照顾将他留在后方,出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所主任。上任后肖玉璧以功臣自居,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经营私人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的破坏队。^[3]案发后,舆论一片哗然,老革命堕落成为贪污份子成为党内外热议的舆论事件,边区政府依《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判处其死刑。肖玉璧给毛主席写信求情,毛主席则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这件事在解放区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陕甘宁边区被当地群众称为“奖廉肃贪的模范。”^[5]《解放日报》专门对肖玉璧的案件发表评论:“肖玉璧案件是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4]通过在党报上刊登评论对肖案定性,直接表明党对该类事件的态度,进一步表明我党整顿贪污腐败类事件的决心。

3. 十八大以来形成全媒体舆论宣传格局。十八大以来,我党坚持反腐倡廉舆论先行,通过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舆论宣传格局,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老虎苍蝇一起拍的舆论氛围。“十八大以后,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5]“仅2018年中央纪委检查机关立案63.8万件,处分62.1万人(其中党纪处分52.6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1人。”^[6]新媒体赋能的背景下,贪腐类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形成了线上线下联动的新格局,其中两微一端平台效应突出,为我党提供了贪污腐败事件舆论引导新渠道。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贪官落马后,我党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及时、主动地公开其罪行和被捕经过,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捕后通过微博直播其庭审现场。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是维护我党形象,维护民心的重要方式。

二、党外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

党外重大突发事件是指发生在党外,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突发事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被反动统治阶级仇视的政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党外敌对势力对我党镇压、绞杀类事件频发,企图将中国共产党扼杀在摇篮中。该阶段党外重大突发事件以敌对势力和反动派发动的突袭性事变为主。每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敌对势力高强度的舆论交锋^[7]。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党外重大突发事件的范围也发

① 注:雷经天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政府管理

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党外突发事件是指党外发生的,对党和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各类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党外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的特征有:从空间维度看,强调全域性舆论引导阵地的建设。从时间维度看,强调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及时性。从叙事手法看,在舆论引导中将“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结合起来,善于借助“第三方力量”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一)从空间维度看,强调全域性舆论阵地的建设

纵观百年党史,全域性舆论阵地的建设早已有之。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要建设全域性的舆论引导阵地^[8]。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提出,“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就要“争取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建立全国公开的报刊发行网络”^[9]。延安时期,我党已经建立起覆盖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华南抗日根据以及日伪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域性报刊发行网络。这些报刊发行网络成为我党进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大动脉,及时将我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输送至各个区域。这些报刊在回击国内外一些媒体的虚假宣传、获取民心、扭转舆论风向、推动事件解决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介化社会到来后,我党充分利用互联网络技术建立起横到边缘,纵到底部的舆论引导网络。2019年新冠肺炎爆发以后,党和政府建立起联通中央、省、市、区县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实时公布疫情进程和防控信息,积极表达党和政府防控疫情的信心和决心,对稳定民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我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保障。

(二)从时间维度看,强调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及时性

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且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10]。及时公布事件真相,明确表明党的态度、立场和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外重大突发事件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特征。如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方面的侵华战争,深夜,新华社接受到消息急送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中共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8日由新华社播发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第一时间公布日本侵华真相,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抗日的决心,并号召全国人民、全国军队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66-1976年十年内乱中,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管控日渐严格,舆论引导多从维护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件包括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的通稿,用不到400字的篇幅对这一灾难事件进行报道,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

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报道重点侧重于人民在毛主席引导下抗震救灾,对地震灾情的详细情况仅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十余字带过^[11],对于具体伤亡人数直至1979年11月才由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地震会议上公布。该时期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相对滞后,未能满足受众对灾难事件核心信息的需求。

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我党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转折点,“非典”之前中宣部对国内灾难性事件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新华社统一发稿。这种信息处理和舆论引导方式有利于避免外界干扰,使相关部门可以在集中精力处理事件的同时避免信息公开之后可能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但也存在多种弊端,比如,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瞒报或者延报行为。“非典”过后我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缺位”到及时“补位”的转变。中央要求建立各级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要做到不谎报、不瞒报、及时、主动进行舆论引导。

(三)从叙述手法看,强调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的结合

在党外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中,我党善于将“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结合起来。这两种舆论引导方式的结合有助于海内外群体认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其中“自我叙述”是指我党作为舆论引导的主体,主动发声,表达自己的观点,讲好自己的故事。“他人叙述”是指通过第三方发声,借助他人讲好自己的故事,帮助自己进行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国外政党各自持有不同、甚至相对的意识形态,这是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引导的一大障碍。为了跨越这一障碍,需要动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搭建起涵盖党组织、普通群众、国外友人多方协作的舆论引导格局。我党官方的舆论引导具有系统性、组织性,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主要力量;党外群众和国外群体作为多元讲述者则有助于普通群体和国外受众的自我代入和价值观认同^[12],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重要补充部分。

在党的历史上将“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相结合进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例子早已有之,典型如我党对“皖南事变”的舆论引导。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皖南事变,从“自我叙述”的角度出发,一是在解放区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地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反共的阴谋。二是《新华日报》作为我党唯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并在全国发行的报纸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和舆论封锁,刊登周恩来题写的“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反共内战阴谋公之于众。从“他人叙述”维度看,“皖南事变”发生后按照中央对外统一的宣传口径,周恩来电告回美途中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建议她回到美国后对外发表她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

言人的正式声明。斯特朗随即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布相关声明,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3]“皖南事变”中通过“他人叙述”向国际社会公布事变真相,有助于帮助我党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后,“3·14 拉萨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是我党通过“自我叙述”与“他人叙述”相结合的方式,多元主体联动还原事件真相进行舆论引导的典型案列。“3·14 拉萨事件”是达赖集团经过精心密谋挑起的重大突发政治风波,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复杂的舆论斗争。在“自我叙述”中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及对外宣传的主力军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牢牢掌控信息发布和澄清事实的主动权。“他人叙述”则通过积极邀请包含美联社、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报、英国《金融时报》、俄塔社和日本共同社在内的17家境外媒体赴拉萨采访,鼓励外媒将其在拉萨的所见、所闻客观中立的报道出来,有利地回击了国际社会对我党的无端控诉和抹黑。我党采用“内外”结合的舆论引导方式,多元主体联动还原事件真相,使这次事件的舆论引导成为揭露达赖真实面目的成功战役。

三、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舆论的经验启示

建党百年来,我党创造性地构建了党内、党外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两种模式,但无论对党内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还是对党外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优先。并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时、效、度”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舆论引导实践模式。

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出发进行舆论引导。建党百年来,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沉着冷静理性思考问题。在突发事件爆发之际和人民群众需要之际,中国共产党,敢于承担历史责任,与人民共甘苦,与时代共命运。从党内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看,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原则,积极利用媒体通报对贪污腐败人员的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通过强大的舆论攻势对各级干部进行廉政教育,有效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党外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看,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日起就把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一百年来,无论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如何变化,国内外局势如何演变,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优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信奉的准则。

强调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时、效、度”。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百年历程中,我党创造性地回答了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时、效、度”问题,体现了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中国智慧。一是强调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时”,“时”既是时间,也是时机,涉及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进行舆论引导。一方面我党强调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及时性,要求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并明确表明党的态度、立场和观点。但对于较为

敏感的突发事件,我党在进行舆论引导时更关注时机。例如对于张国焘公然叛党事件,我党第一时间公布了其叛党的事实并公开宣布开除其党籍。而在林彪叛逃事件中,由于事件影响重大,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动荡和猜测,我党则更重视舆论引导的时机,在充分做好准备之后才向社会公开林彪叛逃事件。二是强调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通过“全域引导”和“多元引导”的方式确保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果。第一,建立全域性的舆论宣传阵地。通过建立覆盖全国的舆论引导脉络及时将党的立场、态度和观点输送至全国,避免因信息传达不到而出现舆论引导盲区。全域性舆论引导脉络空间的构建是我党进行有效舆论引导的支撑。第二,采用多元化的舆论引导方式。将“自我讲述”与“他人讲述”相结合,使我党的舆论宣传更容易被多元主体接受。例如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对外舆论引导中,我党多次采用邀请国外记者“走进来”把事实真相“传出去”的舆论引导策略,这种第三方视角的叙述方式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三是强调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度”,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往往涉及多方利益的冲突,舆论引导缺位则会把话语权让位给他人使我党处于被动地位。而舆论引导过度则会过犹不及。把握舆论引导的度,在事态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适度的舆论引导是我党百年来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 [1] 秦川牛. 毛泽东亲批处死的七个贪官[J]. 刊授党校, 2009(5): 54-55.
- [2] 孟昭庚. 黄克功案件始末[J]. 党史纵横, 2015(8): 58-60+63.
- [3] 窆欣平. 毛泽东与“肖玉璧事件”[J]. 党史博采, 2000(10): 19-23.
- [4] 曾任张家畔税务长肖玉璧判处死刑, 贪污公款三千余元[N]. 解放日报, 1942-01-05(001).
- [5] 杨晓渡. 十八大以来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EB/OL]. 人民网, (2017-10-19) [2021-11-10]. <http://cpc.people.com.cn/19th/GB/n1/2017/1019/c414536-29596644.html>.
-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9-01-09(01).
- [7] 吴锋. 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博弈机制研究[J]. 电子政务, 2012(10): 42-49.
- [8] 廖永祥. 新华日报史新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8: 1.
- [9] 毛泽东.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C]//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59-60.
- [10] 刘见初. 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28.
- [11]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N]. 人民日报, 1976-07-29(001).
- [12] 刘小燕, 赵莹源. 联通中外: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的基轴[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8): 66-69+73.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501.

[责任编辑、校对: 党 婷]